

决策参考

2021年第12期（总第73期）

南阳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
高等教育研究所 编

建党百年专题

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高等教育百年：一项问题史的研究	1
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逻辑与历史贡献	21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与 未来走向	45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百年考察	63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	84

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高等教育百年： 一项问题史的研究

周光礼 公钦正

问题史学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提倡跨学科的整体论方法，主张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是一个回应时代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过程。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下逐步演化出来的。如果不理解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就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大学。中国当代大学至少有三个源流，一是源于中国古典书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传承创新形成的“延安模式”；二是源于欧洲大陆的罗马传统，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转换创新形成的“苏联模式”；三是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经民国时代诸大学的引进吸收再创新形成的“美国模式”。“延安模式”是真正本土化的模式。

一、引论

作为新史学的重要分支，问题史学反对传统的叙述史，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哈罗德·珀金认为，“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韦恩·厄本和杰宁斯·瓦格纳甚至认为，历史是社会建构的，如其所言，“我们将历史视为一个仍在不断进行的过程。不仅过去对现在构成影响，而且现在人们的关注和问题也推动着历史学家改变或重新调整对过去提

间的方式，并以新的思维方式思考旧的问题……我们都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像生活于我们之前的人们一样，我们也面临着决断和选择，这些决断和选择将决定我们的现在，并形成一段历史，而其他人将在某一天来试图理解它。历史，因此是社会建构的。”

问题史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具体而言，“它既研究未被人承认的和人们尚未预见的变革，同时也研究人们计划的或有意进行的变革；既研究影响全部人类组织机构兴衰的潜在过程，也研究对待变革的顽固抵抗行为。”应该说，问题史最适合的运用领域是高等教育变革史。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言，“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能体现上述思想的要数高等教育发展史了。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论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事物虽在变化，其名仍然无异”。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是一个回应时代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过程。湖南自修大学和陕北公学既是回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需要，又与中国传统书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既是回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需要，又体现了“苏联模式”中国化的探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的转型，既是为了回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又体现了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抱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既是回应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需求，又体现了强调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和重点建设的政策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二、湖南自修大学与书院传统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然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以致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端严酷的社会环境。建党初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但是受到理论研究不够彻底、传媒资源和经费短缺、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低下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影响深度和大众化、本土化程度十分有限，亟待进一步宣传并扩大其影响力。此外，由于此时党的组织力量还十分薄弱，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仅有58人，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亟需培养一大批高素质革命干部，以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工农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呼唤一所新型大学的出现。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最早一所专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也是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的最早实践。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寄给黎锦熙的信中首次描绘了对自修大学的大体设想：“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3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1919年3月，毛泽东关于创办自修大学的想法已经非常具体了，他在致周世钊信中特别强调：“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

合同志租一间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921年8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在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董事长仇鳌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与何叔衡一起在船山学社校址上，利用省政府每年4000元的拨款创办了理想中的“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学校开始招生；次月，被誉为“革命策源地”的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开学。这所学校共培养了200多名党的干部。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反动军阀赵恒锡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名强行关闭，之后，大部分学生转移到了中共湘区执委创办的湘江学校中继续学习。

湖南自修大学十分注重引导学生自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船山学社的藏书楼改为图书馆，购置了421种、总计1004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以使学生尽快“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湖南自修大学还创办了刊物《新时代》，并将其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刊载讨论“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等问题的文章。此外，自修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非常重视理论结合实践，学生不仅要学习研究理论知识，还要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和应用。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自修大学的学生发动和组织了湖南省第一次工人运动，成立了湖南青年救国团、湖南外交后援会等爱国组织，沉重打击了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湖南自修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精神和健全人格、能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骨干。这些革命骨干不仅壮大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而且为湖南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南自修大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等教育理念。一是学生中心，毛泽东十分反感他所接受的填鸭式教育，认为在严苛的学校管理中，学生作为学习者的中心地位彻底丧失，因此，湖南自修大学特别注重发展学生个性，并引导他们自主展开学习和研究。二是平民主义，自修大学力矫“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弊病，不仅打破学术秘密，使“有志向学者”可以入学，而且只收取学生的杂费和伙食费，酌情收取学费，让贫困者也能入校学习。三是工读结合，毛泽东自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曾设想过一个具有浓厚“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村计划”，直到1920年5月，在上海尝试实施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才从成立“工读互助团”的设想中回归到创办“自修大学”上来，但工读结合的做法却在自修大学中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应该说，毛泽东的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古典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书院“遗传基因”的时代表达，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代表时代精神，书院精神是流动的而非凝固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正是体现的民主共和精神、马克思主义理想等时代精神；第二，讲学与议政，古代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亦为议政的机关，而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既学习理论，又关注时事，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参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第三，自修与研究，书院最早本就是藏书研读之所，毛泽东认为，“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这里的“研究的形式”就包括了“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因此，他强调自修大学的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

三、陕北公学与延安模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成

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长达十年的内战基本结束。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大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对而言局势更为稳定。然而，经过万里长征，党中央和红军队伍到达延安时，全国红军不到3万人，中共党员也仅4万人，部队减员十分严重，党的力量受到较大削弱，“要干部的呼声遍于各地”，边区政府急需培养一批可堪重用的党政军干部。与此同时，大批爱国青年追随党中央的脚步，云集在延安，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分别负责培养的是军事人才和党的高级干部，为妥善接纳进步青年，造就更多可堪重用的干部人才，创立一所能够容纳更多学员的新型干部学校势在必行。

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创办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此时的边区，物资极其匮乏、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校舍，陕公全体师生就与党中央调来的干部和战士一起挖窑洞、建校舍；没有教员，毛泽东就从全国请来学者，由领导同志兼任教员。在党中央与陕公师生共同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做报告。实际上，毛泽东曾前往陕北公学做形势教育十几次，先后提出了“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等著名论断，并多次为陕北公学题词，建校之初所作的长篇题词至今仍镌刻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一块巨大影壁上。1938年，日军将矛头指向延安，国民党也开始不断加强对延安地区的封锁。为打破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1938年7月7日，党中央在地理位置更便利的旬邑县看花宫村举办了陕北公学分校，至1939年1月，陕北公学在延安的总校仅剩400余名学员，中共中央遂决定将总校也迁往看花宫，与分校合并。1939年7月，国内形势再度变动，陕北公学正式改编为

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开赴敌后办学。1939年12月，鉴于抗战前线和革命根据地源源不断地输送青年到延安学习，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公”。

陕北公学不负党和人民所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一方面，陕北公学满足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教育需要。毛泽东曾多次提出要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即“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为此，陕北公学在学制安排上强调短期灵活，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少而精，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用结合，在师资安排上强调专兼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坚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陕北公学的学员们积极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进行生产运动，克服了陕甘宁边区极其困难的物质环境。另一方面，陕北公学在短时间内将大批普通青年培养成为抗战急需的各类干部。1937年8月至1941年8月，陕北公学培养了近万名抗日救国的先锋，其中，“前期陕公”共培养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党员3000多名；“后期陕公”在近两年时间里培养干部3000多名。从陕公毕业的学生积极响应“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战线，极大地满足了战时对抗日救国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干部的需要。

陕北公学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典型代表，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陕公是民族的，她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之中，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陕公是科学的，她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陕

公是大众的，她向从五湖四海涌入延安的爱国青年张开双臂，是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陕公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的是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的革命教育。此外，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以苏区高等教育办学经验为基础，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地区的人民，创办和发展了有别于旧教育、西方教育的高等教育事业，并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特征和鲜明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可以将其称为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其特征主要有四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培养革命干部和建国人才为办学宗旨；二是采取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三是开创了“思政课+专业课”的课程结构，贯彻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四是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学者治校、民主管理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伟大实践，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初步探索，不仅满足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需求，而且也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中国人民大学与“以俄为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肩负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使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形成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并挑起朝鲜战争、出兵台湾及台湾海峡，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我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成政治上的同盟。1949年上半年，随着革命形势朝着夺取政权的方向发展，建立各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大城市接管了200多所大学，但这些按照欧

美理念建立的旧社会的大学，没有一所能够承担培养“懂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苏联为创建马列主义指导的新文化、新教育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了迅速培养一大批讲政治、有文化、敢担当、能作为的建国人才，“以俄为师”创办一所新的大学成为建设新中国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支持下，由刘少奇提出并直接领导创办的。1949年7月6日，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在莫斯科办一中国大学，为中国训练建设与管理人才”，斯大林很快回复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毛泽东也“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由于中共代表团与苏联方面就提供贷款、派遣专家等问题商谈得非常顺利，这所中国大学最终选择“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1949年11月12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报告筹备情况，提出“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的办学计划；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一计划；5天后，政务院随即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在党中央的支持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得到了快速成长，不仅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人才，而且为全国的大学树立了办学榜样，1954年4月12日至21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会上提出全国各院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1954年8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被确定为“全国性重点学校”，旨在“带动其他学校共同前进”。

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他们直接指导并参与了中国人

民大学的早期办学实践，在制定各类计划、创立各项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创办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也最需要向苏联学习的专业。在取消了学院一级建制后，教研室成为人民大学的核心机构，其中心任务是教学和科研，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着“工作母机”的作用：通过苏联专家开设讲座、青年教师“边学边教”的方式，快速培养师资力量；强调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相结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专业所需的一般科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复制苏联高等教育中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必修课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核心；翻译和整理苏联专家编写或推荐的讲义、著作和经典原著用作授课教材；创办《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并在每年年初由教研室形成科研计划，在每年年末或一些庆典日召开“科学讨论会”，交流科研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在“以俄为师”背景下，将“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办新的大学”之探索，是满足新中国迫切干部需求和教育需求之典范，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直接产物，而高等教育的“以俄为师”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通过“院系调整”，初步改善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问题；实施“专业教育”，一改过去大学教育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的状况；引入“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严格而紧密的教学结构。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后，党中央对“以俄为师”的态度转变为“以苏为鉴”，苏联模式一时间被作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遭到强烈抨击。当然，“以俄为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也的确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是“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僵化，最终陷入低水平、无效率、重复

办学的“泥淖”中；二是以功利目的为中心的、工具价值取向的“专业教育”，将中国大学自古以来具备的超功利的人文精神消磨殆尽；三是在“部门办学”形成的行业高等教育体系中，单科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占主体，致使中国院校类型和专业比例严重失调。应当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老实实地学习苏联”几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也导致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后，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旋即被彻底抛弃，同时，在突破苏联模式、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坎坷波折乃至剧烈震荡。

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教学科研双中心”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党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工作，以此为标志，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20世纪80年代，高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科技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增长与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提升的决定性要素。然而，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科技和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瘫痪，高考制度的废除更是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人才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制约我国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1976年10月，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大进军”；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尽快培养一批能够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要求、适应高端科学技术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愿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的创办，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填补国家科技空白，满足“两弹一星”计划对尖端科技人才的需

求，1957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受到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大学“所系结合”办学模式的启发后，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创建一所新型大学的想法，使之坚持“科教融合”理念，克服“苏联模式”中“将教学置于高校、将科研置于科研院所”的弊端。这所大学就是1958年9月由邓小平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在中科院的支撑下，一时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截至1966年，该校培养4710名毕业生，仅前3届毕业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者就有30余人。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科大校本部由北京迁至安徽合肥，导致仪器设备损失 $2/3$ ，教师流失 $1/2$ 以上，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学校几乎面临难以为继的瘫痪局面。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专门指示中科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中科大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中勇立潮头，率先采取了一系列“胆子、步子”都很大的改革措施。一是提出“教学科研双中心”的办学定位。作为中科大的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曾先后将中科大定位为“既是一个教学单位，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和“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为贯彻“双中心”的办学定位，中科大不仅为本科生专门开设研讨班课程，而且所有的实验室均面向本科生开放，通过实践“科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意识的尖端科技人才。二是创办研究生院。1978年3月1日，中科院在北京的旧址上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科大的研究生教育充分依托中科院的师资、项目与设备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首创硕博连读体制和本硕博分流教育体制，使有潜力的学生能够尽早接触到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实现了本硕博一贯式培养与因材施教的有机结合，是“教学与科研双中心”的创新性实践。三是创办少年班。

1978年3月8日，由21名不满15岁的学生组成的中科大第一期少年班正式开学。少年班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由中科大不断探索形成的一种破格录取早慧少年并集中起来加快培养的教育模式。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免试推荐”方法的突破，少年班的创办如同“科学春天”的“迎春花”，拉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党和国家对尖端人才真挚而紧迫的需求。总体而言，自1978年以来，中科大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科技领军人才，数十名毕业生当选为院士，平均不到十天就获得一项科研成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早确立了大学是“教学科研双中心”的办学定位，积极探索了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道路。但由于该校依托中科院办学的优势并不具有普遍性，我国“科教分离”的教育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没有受到触动。改革开放后，中科大率先提出“教学科研双中心”的理念，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1977年7月，邓小平做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的重要论断；同年8月，邓小平再次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双重任务”，完成了指导大学改革的顶层设计，自此，我国大学开始系统改变只有教学一个中心的问题。应该说，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并实现合法化、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过程，“教学科研双中心”的大学定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创办满足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需求的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实践。

六、华中科技大学与理工大学综合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人才和技术的较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格局进入大调整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满足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1995年，我国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将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国家间的竞争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只有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科技才能发展、经济才能腾飞。要培养高素质人才，非综合性大学所不能，为此，中国的单科性大学，尤其是数量最多的理工大学，在这一时期纷纷走上综合化的转型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中大”）是理工大学综合化的典范。其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华中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与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中大就提出了向综合化大学转型的目标。华中工学院是“院系调整”的产物，定位为华中地区的重点工科院校，1975年11月，朱九思在向国家教委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在工科大学中设置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专业，但囿于政治原因而未受到重视。1980年，在考察了美国、加拿大、日本3国的高水平大学后，朱九思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这就不仅要求实现理工结合，而且要把实际上已经开始设立的文科和经济学科加以扩大”，自此，学校确立了“综合化”的办学思想，开始了向综合化大学转型的艰难历程。

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综合化战略使学校初步形成了文、理、工、管相结合的格局，但未来的综合化道路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华中理工大学的综合化转型才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幅调整中迎来高潮。首先，1997 年华中理工大学就先于国家政策在人文学院进行了扩招，使当年 4 个文科系招生人数基本上翻倍，壮大了学校的文科专业，1995 年时，华中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的本科生占比仅为 1.5%，到 2005 年，这一比值已增长到 14%。其次，2000 年完成并校后，华中大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学科门类进一步丰富。学校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以文科、理科为基础，以工科、医科和管理学科为主导，以信息学科和生命学科为龙头”的学科布局，这表明华中大已经开始以合并为契机，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不断增强学校在学科层面的综合化进程。最后，自 1994 年以来，华中大通过开设人文讲座、开展社会实践、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等方式，充分利用已有的综合化基础和多学科优势，不断探索实践文化素质教育，从而实现将学生培养成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目标。

华中大的综合化转型是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理工大学综合化的一个缩影。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中，产生了一大批实施专业教育的专门院校，这些单科性或多科性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尽管具备一定的业务基础和技术水平，但专业口径和知识视野十分狭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特别欠缺，很难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大多数理工科大学在经历了

“大学扩招”和“院校合并”的浪潮之后，已经基本转型为以学科门类齐全和规模较大为特征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培育青年的民族精神、促进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实际上，不同学科并存只是理工大学转型为综合性大学的基本要求和初级形态，在此基础上，转型后的理工大学为各个专业的学生提供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甚至开设跨学科专业；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项目，加强不同学科专家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通过不断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实质融合与交叉渗透，真正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根据世界经济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以研究和创新为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我国在核心科技领域从“赶超”到“并跑”，进而“领跑”的地位角色转换。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转变，使科学研究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成为提升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与战略支撑。作为高度整合知识生产、分配和应用的部门，大学已然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世界各国也因此而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断投入资源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前哨。

事实上，早在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利用新获得的办学自主权，结合自身实力、国家需求和国际比较，主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并

将其付诸行动。1985年8月，清华大学在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1986年8月27日，时任校长丁石孙在北京大学中层干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北京大学办成全世界一流的大学。”198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题为《北大要成为世界一流高等学府》的讲话稿，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这是清华、北大最早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尽管在之后的学校发展规划纲要及学校党代会报告中，这个概念一再出现，但一直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北大校庆大会上郑重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至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985工程”也随即启动实施。

应该说，在“211工程”“985工程”等国家战略的集中投入、重点建设下，我国的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实力快速增强，高校知识创新能力得到空前提升。然而，“211工程”“985工程”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因此，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决定整合“211工程”“985工程”，实施“双一流”建设；2016年6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211工程”“985工程”正式终止；2017年1月2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同年9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最终目标，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新政策形态。

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带本土文明的底色，脱离本土文明底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指标意义上的。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二是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前者关注在国际可比指标上达到世界一流，后者强调一种本土的大学模式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带来实质性的启示。应该说，在“211工程”“985工程”的重点建设下，清华、北大的办学条件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后得到了显著改善，在办学“硬件”和论文产出“指标”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显著缩小，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已经基本实现，但离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不小的差距。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道路观，是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由于“211工程”“985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长期处在“赶超”与“借鉴”的政策氛围中，文化层面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大学精神等受到忽视，出现了“软件”跟不上“硬件”步伐的问题，因此，在文化意义上建设一批能够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

八、分析与讨论：建构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究竟是欧洲大学模式的凯旋，还是中国本土传统的复兴？这个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争论。有人认为，存在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毕竟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有人认为，不存在高等

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模仿多于创新。我们判断究竟有没有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就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能否为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启示与借鉴。通过问题史的梳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确有其独特的逻辑。

1. 大学概念的独特性。当前世界主流的大学概念是美国的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中国本土的大学概念与此完全不同。中国本土的大学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大学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立德树人。大学的目的是明明德，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配天地。二是强调大学的政治目的。大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管制。正是这种独特的大学概念塑造了中国独特的高等教育制度。事实上，大学十分倚重本土的文化传统。如果“在大学的文化、组织环境中缺失了‘大学’这一概念，要创建一所大学就会举步维艰；大环境一旦存在建构‘大学’的蓝图或模式，大学的整个创建过程就会轻而易举。”

2. 大学合法性的独特性。在西方，现代大学获得合法性的途径有两种，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其中，认识论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合法性逻辑，从历史传统来看，“雅典学派”的精神强调学者能本着一种纯粹的好奇心从事学术探究，可以“为学问而学问”；从当代信念上来看，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特点是高深学问，学术性是现代大学的突出特点。中国大学获得合法性的途径只有一个，即政治论是唯一的合法性逻辑，强调大学在满足社会需求中获得合法性。从先秦时代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到最近高等教育的“四为方针”，都强调大学必须遵循社会需求逻辑，

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3. 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从高等教育治理来看，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根据政府与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可以将高等教育治理分为两种基本模式：科层模式和市场模式。英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是典型的市场模式，即英美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原则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则是一种科层模式，即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原则是政府主导的，大学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可见，政府行为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

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下逐步演化出来的。如果不理解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大学。中国当代大学至少有三个源流，一是源于中国古典书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传承创新形成的“延安模式”；二是源于欧洲大陆的罗马传统，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转换创新形成的“苏联模式”；三是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经民国时代诸大学的引进吸收再创新形成的“美国模式”。其中，“延安模式”是真正本土化的模式。历史的变革与稳定是问题史学者主要关心的对象，历史表明，所谓的新事物不过是我们尚未了解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言，“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甚至过去的缺陷与不满也体现在现代高等教育的结构中”。每个历史时期大学的变革都是过去社会对传统大学表示不满的产物。对现代学校师生关系疏离的不满，促使毛泽东按照传统书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对民国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满，促使中国人民大学的创立；对苏联模式“科教分离”的不满，促使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的产生；对单科性大学的不满，促使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科综合化。因此，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对当前大有裨益，这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的意义所在。（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公钦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05期。）

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逻辑与历史贡献 ——基于党执政以来的理论发展与政策实践的研究

刘国瑞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和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了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不断把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党的高等教育思想既体现在各个时期针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和实践上，也蕴含在党对整个教育的总体要求里。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深刻认识和把握党的高等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中蕴含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重大贡献，对于增强“四个自信”、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逻辑：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是与三大思想体系的形成脉络相一致的接续性继承与创新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毛泽东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标志，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教育问题，始终把教育看作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教育的基本原则和重要观点，诸如教育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通过实施全面教育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习近平重要教育论述等重要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既是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对人类社会一般规律认识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揭示了实践这一规律特别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经之路。

党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体系化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紧密相连，内含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成果形成过程中的与时俱进和接续发展。

(一) 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教育思想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关于发展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实行国家办学、厂矿企业办学和群众办学并举；关于“我们的教育方针，应

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社会属性的原理和全面发展的学说，深刻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大思想灵魂，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建立确定了基本原则。

(二)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是这一体系的开创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之赋予了新的重要内涵。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就教育发表了一系列论述。邓小平教育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特别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突出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强调“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二是明确了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是深化了对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强调“现代经济和技术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¹⁰⁷四是深化了对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强调“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¹¹⁰五是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办好教育的关键在教师的思想，强调“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邓小平教育理论深刻体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道路对教育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思想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实现路径。邓小平教育理论极大地深化和拓展了党对教育的地位、属性、功能、发展道路、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指针，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需要，江泽民就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强调“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江泽民的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理论关于教育属性、育人目标、战略地位等的认识，揭示了教育与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关系，阐明了教育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上的地位与责任，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导。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了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需求，胡锦涛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断，在教育地位和属性上，强调“教育既是国计，也是民生”；在教育发展理念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在教育发展重点上，强调“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在教育发展目标上，把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的教育思想阐明了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与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教育提高到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的新高度，为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引领。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重要教育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格局、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紧密结合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发表了深刻的、系统化的论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其核心是“九个坚持”，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坚持把教育事业摆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坚持把社会主义作为教育的根本性质，坚持把扎根中国大地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道路，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理念，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时代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作为教育发展的基础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教育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科学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使党的教育思想成为更加科学、

更加系统、更加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科学指南。

二、历史逻辑：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是与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相协调的持续升华

回顾 70 多年来的历史可以发现，党对高等教育认识的演进，深刻地体现了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一) 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对高等教育地位、道路认识的升华

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方面，从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世界四次工业革命的演进轨迹中，党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是实现工业化、转变增长方式直至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性因素；从世界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中，党深刻认识到“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坚定“四个自信”、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选择。这两大认识的深化推动了党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两个升华。

1. 党对高等教育战略地位的认识升华。70 多年来，党对高等教育地位的认识经历了从经济社会发展组成部分、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之一、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到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不断提升。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高等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从 1953 年起国家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教育事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高等学校实行直接指令性计划。党的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

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党对高等教育地位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从此，教育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拥有了与经济社会并行的相对独立的地位。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突出战略地位”到“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一重大变化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安排、财政资金保障和公共资源利用等方面，更好地凸显教育的地位、更大力度地支持教育发展和更好地满足教育需求，提供了政策和思想依据。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重申“优先发展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的具体要求。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而把教育进一步提升到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上述思想。这期间，1995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两大战略的明确，标志着教育事业上升到国家

重大战略层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党和政府把高等教育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清华大学的信中指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从而把教育优先发展体现到建设教育强国这一战略目标上，提升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不但把教育提升到“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新高度，也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教育的目标、路径和抓手以及实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标志。

2. 党对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认识升华。“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70多年来，党对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模仿到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再到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办学的提升。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按照这些思想和原则，党和政府一边仿照“苏联模式”，通过大规模院系调整等方式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集中有限的教育资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的人才；一边坚持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探索以“延安道

路”经验为基础构建新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独立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里程碑，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和独立探索的阶段。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既要调动中央的积极性，又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与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相结合、“两条腿走路”方针；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这些重要思想和精神，确定了我国高等教育走自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与核心要义。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三个面向”方针指导下，党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时间里，紧密结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党和政府在坚持全国“一盘棋”规划的同时，注重调动和发挥地方与行业的积极性；在坚持公办和公益性“双为主”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路径；在不断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公平正义能力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和企业投资教育；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前提下，推进建立“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现代大学制度；集中财力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系列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拓宽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开创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四个自信”，更加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

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强调“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保证、基本原则、基本道路、工作目标和战略目标等重大原则性问题。贯彻落实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以“双一流”建设等重大项目（工程、计划）为载体，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为标志，中国正昂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高等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更加坚定。

（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对高等教育属性认识的升华

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方面，党深刻认识到必须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路线和发展任务，不断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从政治统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战略性调整。这一认识深化并推动了党对高等教育属性与功能认识的升华。70多年来，党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注重政治属性到突出经济属性、重视政治属性，再到全面认识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属性的提升。与此相伴，党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认识，也从突出政治功能向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并重，再到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功能等综合价值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直接相关，突出强调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高等教育第一位的任务是为政治服

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应以“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这一时期的“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服务。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教育方针中首次明确强调教育的政治性。“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这一属性走向极端化。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贯彻落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高等教育的经济属性和民生属性凸显，高等教育的功能拓展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99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其后，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大报告均重申了这一表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新的重要目标，这是党对教育的民生属性和民生功能认识的重要突破，也是党在教育发展目标上的重要进步。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高等教育的综合属性日益强化，高等教育功能拓展到“四为”服务。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四为服务”深刻体现了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

现了党对教育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独特地位和作用的重视，体现了党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一贯要求，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规律，标志着党对教育属性、功能的认识已经上升到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新境界。

(三) 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与对高等人才培养目标认识的升华

在党的执政规律认识方面，党从自身历史和国际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发展始终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宗旨的根本体现；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理论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居于重要地位。70多年来，党从各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总政策出发，不断深化和完善了对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党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育人目标，凸显国家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是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具体要求。这一要求既丰富了全面发展的要素，明确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治和业务要求，也突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显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改进，是党对教育目标认识的重大进步，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党将高等教育的育人目标调整为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999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思想包含着若干重要的进步，一是在实现培养目标的路径上，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发展到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二是在全面发展的要素上增加了“美育”，体现了全面发展的新境界。三是在具体目标上，用“建设者”代替“劳动者”，更加具有时代感和科学性；而“接班人”的提出，则凸显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高等教育工作格局上更加突出“育人”的根本地位，在“育人”体系中更加突出德育的优先位置，在培养规格上更加突出全面的素质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坚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基本目标的同时，更加突出了“立德树人”的要求。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均明确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些重要论断，不但细化了党对“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还将其提高到“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高度，进一步凸显了党在新的形势下巩固执政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高等教育的更高要求。

三、实践逻辑：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经历了与“三次重大转折”相同的三次跨越

党的高等教育思想始终彰显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质。这一认识体系源于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教育与国家、教育与政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与民生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这一认识体系是以中国国情为基本依据，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总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本出发点，以破解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为着力点，以国际大环境为重要参照系，紧密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总路线，不断实现经济、政治、民生、教育协调发展的过程。这一认识体系始终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具有与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相同步的显著特征，以及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四个自信”相契合的内在逻辑，是引领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建设、发展和改革不断前进的理论。

党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并通过法规、政策、规划等体现于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矛盾的具体实践中。其中重大的思想原则通过法律得以固化，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将党关于教育方针的表述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从这个意义讲，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是党的教育思想的延伸形式，是党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70多年来，党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施改革开放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次重大转折。在这个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来认识教育问题，

重视在实践中不断调节和优化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实践实现了三次跨越。

(一) 第一次转折与跨越：新中国成立初30年（1949—1978年）

这一时期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从根本上讲是特定国情所决定的，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治理逻辑的特殊性。在一个经历了百年耻辱、刚刚推翻了“三座大山”、又马上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封锁的新中国，没有比巩固新生政权更重要的事情。帝国主义的封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迫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高等教育发展的所有选项，归根结底都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二是经济发展逻辑的特殊性。在一个农村农业农民始终占有绝对比例且未经历充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然面临手工业生产与现代大工业化生产交错进行的问题，加快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是一个事关全局和命运的重大而急迫的任务。实现工业化离不开科技和教育，优先满足工业化需求，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在这一历史阶段，党和国家主要立足于政治目标来思考、定位教育问题，强调教育以政治为中心，为巩固人民政权服务；突出重化工业发展需求，重点发展理工科专业；依靠集中统一计划调节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供需关系。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党在这一时期领导高等教育的实践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的探索：①接收改造旧大学。按照“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思想和原则，党和政府对旧大学进行接管、接办、接收和有效改造，所有的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立高等学校。与此同时，党开启了创建中国人民大学等新大学的实践。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为适应国家

加快实现工业化目标对各类人才的急迫需求，按照“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启动了1952—1953年的高等学校院系的大规模调整。经过院系调整，成立了一大批行业特色鲜明的高等院校，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重文轻工的状况，基本适应了国家工业化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等学校地区分布不合理的问题，搭建起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③集中资源推进重点学校建设。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北京大学等16所高等学校为全国重点学校；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新增加吉林大学等44所高等学校为重点高等学校；至1963年全国重点高校数量达到68所。

经过第一个阶段的努力，党领导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构建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历史性跨越。

(二) 第二次转折与跨越：改革开放时期（1979—2012年）

经历十年内乱后，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发展正在经历巨变，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在这个事关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命运的重大关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在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党领导制定“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济逻辑凸显，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培养能力不足的矛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服务科教

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任务。

党在领导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实践层面主要进行了 6 个方面的探索。①显著提升教育战略地位。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四次全国教育大会，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件，不断把教育顶层设计提高到新的水平。②推动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强调“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极大地推动了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③以改革解放教育生产力。确定了“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的目标，着力改革对高等学校的财政拨款机制、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办学。④深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⑤大力加强高等教育重点建设。1984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教育部、国家计委的请示报告，将北京大学等 10 所院校的建设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1987 年 8 月原国家教委启动重点学科评选；1995 年 11 月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印发《“211 工程”总体建设规划》；1998 年 12 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正式启动“985 工程”。⑥推进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建设。1980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陆续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至21世纪初，建立起以《教育法》为基础，以《高等教育法》为核心，包括《学位条例》《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法律体系。

经过这一时期的努力，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框架初步确立；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快速发展，1978—2012年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数由598所增长到2409所，在校生总数由85.63万人增长到332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55%上升到30%，实现了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不但极大地缓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与有限的高等人才培养能力的矛盾，也为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

(三) 第三次转折与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至今）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资源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凸显；经济进入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任务艰巨，急需实现质量变革、动力变革和效率变革；面对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的形势进一步凸显了高等教育的地位与责任，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撑和科技创新动力，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任务。新形势下，党的教育政策更加注重系统性，更加重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下统筹高等教育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和民生逻辑。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党领导并开创了高等教育新局面。①召开新时代全国教育大会，颁布《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对贯彻落实新的“三步走”战略、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全面部署。②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确定137所高校为“双一流”建设高校。③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召开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印发《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启动“双万计划”，着力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全方位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④全面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颁布《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及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大力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⑤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大力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着力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支持东北高等教育振兴发展，打造海南、粤港澳、雄安等高等教育开放高地。⑥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完成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加强教育规章和地方教育法规建设，推行教育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新时代高等教育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法治保障更加全面。⑦全面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若干措施》及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着力建构落实党的领导全覆盖的工作格局，确

保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确保党对高等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的主体框架基本确立，……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等发达行列，正在实现迈入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新跨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力量。

四、历史贡献：党的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经过一百年来特别是党执政以来的不断探索，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已经凝聚成包括高等教育地位、性质、功能、方针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在内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吸取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精髓，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科学地回答了高等教育的地位、性质、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拥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一致的发展脉络。这一思想体系具有严密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是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的统一，既为丰富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提供了理论营养和科学支撑，也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实践提供了思想引领和强大动力，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

(一)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1.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社会属性的观点。党对高等教育

的认识，拓展了教育的社会属性，将教育作为基本民生和人民最大的福祉，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从单一强调政治属性到强调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综合属性，深化了教育与政党、教育与国家、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以及教育与民生等关系的认识。深化了对教育阶级属性的理解，将社会主义教育定义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新时代教育的任务是为国育才、为党育人。

2.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突破了对生产劳动的狭隘理解，丰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升到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强调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拓展到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等领域，强调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改革；落实到课程、教学改革等层面，组织进行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和学制、课程和教学方法改革等试验。

3.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深化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认识，强调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实现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丰富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素完善为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强调建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强调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共同提高，推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和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拓展了实现全面发展的途径，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大中小教育的整个体系中，着力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配合的育人机制。

(二) 开创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1. 实现了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经过 70 多年的努力，我国在经济和教育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高等教育历史性的跨越，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的同时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保障改善民生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实现了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步提高，高等教育总体水平迈上世界中高水平阶段。1949 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不足 12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0.26%。到 2020 年，在学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 4183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4%。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实现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如从 2012 年到 2018 年，我国高校进入ESI前1%的学科数从 279 个增加到了 893 个，学科进入ESI 前1%的高校从 91 所增加到了 219 所。

2. 有力支撑了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①在提升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 2018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有 2.28 亿人次报名参加高考，高等学校累计培养了 9930.9 万名高素质专门人才，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有 50% 以上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为我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作出了巨大贡献。②在基础科学研究以及技术创新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等学校拥有的高层次人才数、承担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数、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数以及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数，均占全国总数的 60% 以上。

(三) 为世界贡献了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70多年来，党坚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协调处理重点建设与普遍提高的关系，统筹提高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发展和民生需求的能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实

现了经济腾飞、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和谐共进。这一成绩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不但为世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广大的欠发达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既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进程和规律，也深深地镌刻着中国独有的历史传统和国情特色。

1.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党始终把高等教育摆在全国事业的重要位置，高度重视建立、改进和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形成了党中央确定高等教育重大方针政策，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职责分工领导地方高等教育事业，高等学校党委发挥领导核心和院系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格局。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统一。

建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治理结构。统筹处理统一领导与分工负责的关系，不断探索理顺中央与地方在教育领域的财权、事权，既注重发挥中央政府在重大规划、重点建设、结构布局、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统筹作用，亦通过扩大省级政府高等教育统筹权，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在创新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深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 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改革招生政策、改革学制、实行半工半读、建立新型高等学校等措施，来不断发展面向工农大众的高等教育；到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多种形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建立完善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加强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等措施，来不断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有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

和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再到新时代，通过“双一流”建设、打造一流本科教育、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等举措，来着力破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党始终坚持把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初心和使命，实现了从保障受教育权利、扩大受教育机会、提高受教育质量到维护教育公平的升华，以及从维护人民的共同教育利益到兼顾个体的多样化需求的跃进。

3. 以顶层设计协调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高等教育事业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注重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动态调试两者的关系，从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到“国家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优先满足国家需求”，不断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入新的境界，不断增强高等教育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支撑国家发展的能力。

始终重视发挥战略规划的引领性作用。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计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处理好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中央与地方等关系；通过教育规划与国民经济规划的衔接，保证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全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与地方教育规划的衔接，有效统筹国家战略与地方发展需求。

4. 彰显制度优势的发展路径。坚持多渠道发展高等教育。紧密结合国情，不断创新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从“两条腿走路”推动高等教育与非正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共同发展，到协调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推动公民办高等教育以及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有效丰富了高等教育形式，有效满足了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需求。

坚持重点建设与全面提高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新大学、一边实施重点建设计划，到改革开放时期一边加快地方高等教育发展和实施大扩招、一边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计划，再到新时代一边支持地方高等教育提升整体水平、一边实施“双一流”“双高”等重点建设计划，在做大高等教育“高原”的同时，做强高等教育“高峰”；在形成规模优势的同时，增强高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满足人民大众基础性需求的同时，切实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刘国瑞，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05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 百年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与未来走向

王定华 王名扬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百年来，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创立与发展始终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相依。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地位在高等学校的办学实践中得以确立，形成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从阶级教育到革命教育、到国民教育、再到现代教育，党领导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实现了关键性历史变革，极大地丰富了政党领导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从革命时期的艰苦卓绝到建国时期的百废待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轰轰烈烈、改革开放时期的鼎新革故、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民族复兴，党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的使命重任决定了其领导高等教育方向的客观需要。今天，研究中国共产党百年高等教育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两个源头，一是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二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艰苦创办的高等学校。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高等教育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教会学校、私立学校不断衰败消亡，党领导的高等学校持续焕发生机活力。一百年来，党领导高等教育创立与发展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 建党初期自主设立高等学校的初步创办阶段（1921—1937年）

1. 于混乱中发轫：建党初期创办的高等学校。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国内工农运动兴起，新民主主义革命潮流高涨。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自主创办高等教育具有启蒙作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革命方针，指导高等教育创办实际的、具体的理论与教学活动；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也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活动的迫切需要。“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发现真理、造就人才”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方针。

湖南自修大学于1921年8月在长沙创办，是第一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大学。它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通过将学习、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为党培养了一批工农运动领导骨干。上海大学于1922年10月改组，是第一所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旨在培养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和建设新文艺的革命人才，在课程设置方面既注重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传授，又非常注重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

2. 于探索中拓展：苏维埃根据地创办的高等学校。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党在这一时期实施苏维埃教育，确立了“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广大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

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的文化教育总方针，创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红色通讯学校、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等高等教育机构。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于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办，是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其改称为中央党校，旨在培养革命政治工作干部。红军大学于1936年由工农红军学校更名而来，是培养训练红军高、中级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确立了“实事求是、团结友爱、艰苦紧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校训。苏维埃大学于1933年9月在瑞金建立，次年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合并，旨在为苏维埃建设培养各方面的高级干部。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干部学校标志着党探索新型高等教育实践的滥觞。

(二) 革命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积极扩张阶段 (1937—1949年)

1. 于危难中转型：抗日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制定了“实行抗战的教育方针，提倡国防教育，实行文化教育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力发展工农群众的教育”。为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和各种建设人才，党在陕甘宁边区、华北抗日前线陆续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30余所新型高等学校，每所高校各有定位，分工合作，错位发展，各扬其长。

抗战时期党创办的陕甘宁边区高等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十分重要。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运用到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发展新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其次是延安的高等学校逐步向正规化和专门化方向发展，“延安模式”显现。最后是培养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人才，干部队伍

志存高远、信仰坚定、德才兼备、廉洁奉公，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2. 于内战中重建：解放区创办的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1940年初，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爆发前，晋察冀解放区积极开展学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和制度得以实施和发展，初步实现了“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向“教育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服务”的转变。解放战争爆发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得以坚持，强调教育为解放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相联系。解放战争后期，党确立了“教育需要向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正规化’方向发展”的教育方针，对华北解放区的高等学校进行了整合、重组，高等教育向革命化、专业化方向又迈出一步。全国解放之际，为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和完整的学校教育制度成为必需。这一时期，北方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等14所专业学院的组建，拉开了党建立统一高等教育制度的序幕。

研究发现，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解放区高等教育始终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着重于战后的恢复与重建。抗战胜利后，党积极实践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进行城市稳定、正规化办学的尝试；解放区战争时期，党坚持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新要求，以培养“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为目的”，将解放区原有的许多高等学校、学科和专业进行正规化改造，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建设是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革的突出代表。这些历史进程都为新中国创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改造阶段(1949—1978年)

1.于接管后整顿：建国初期以“苏联模式”改造高等教育。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教育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快速整顿国家教育的旧象乱局、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教育事业。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在弘扬解放区高等干部教育的同时，党接收改造国统区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改造、调整、整合、组建，形成了全国范围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教育制度方面，对旧大学的改造成为我国学习“苏联模式”高等教育的开端。1949年我国高等学校由公立、私立、教会大学三种类型构成。共有公立高等学校124所（包括国民政府国立、省立、市立学校）占总数的60.5%；私立高等学校61所，占29.8%；教会高等学校21所，占9.7%。针对当时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布局不合理的现状，党开始推广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通过改造和裁撤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全部收归国有，实现对旧高等学校的改造。1952年秋，以苏联模式为模板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此外，党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对高校原有政治课程进行改造：一方面“破旧”，取消三民主义、训育原理、军事训练等课程；另一方面“立新”，全面学习苏联高校政治理论课程体系。1953年，党基本肃清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在高等教育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此外，教学上还着重发展科学与技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着力适应工业、国防需要。

2.于改造中调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院系调整中的高等教育。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党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为满足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20世纪50年代全国

高校展开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大事，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经历了4个阶段，即1949年底至1950年底以京津沪为主的小范围调整阶段、1951年底至1952年底的全国院系大调整阶段、1953年5月至1953年底以中南区为重点的继续调整阶段、1955年至1957年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高校布局补充调整阶段。这一时期的院系调整力度大、影响广、动作快，对当时整合力量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益的，但也让部分高校后来长时期一蹶不振。这一时期，为提高地方办大学的积极性，高等教育管理权由中央下放至地方。1958年4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指出“除少数综合性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仍由中央教育部或中央有关部门直接领导外，其他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都可以下放，归各省、市、自治区领导。”1958年9月起，高等教育经历3年“大跃进”，盲目扩张造成了高等教育布局失衡、教育质量下滑等问题，高等教育面临再次调整。1961年，教育部多次召开高等教育调整工作会议，对高校的规模和布局进行“瘦身”。首先，大幅度缩减高校数量；其次，定发展规模、定学制、定专业、定人员编制；再次，全国高等学校专业目录从627个降至373个。

3. 于动乱中停滞：“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高等教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高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党对高校的领导遭到严重破坏，高等教育发展停滞，人才培养遭受重创。高等教育在院校规模与布局、学科专业设置、领导体制、招生标准、课程教学等方面均受到严重冲击。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从此我国高等教育面貌一新。

回望新中国成立之后，党迅速接收旧大学，并对高校进行全面改

造，肃清高校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切反动因素，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初步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这一时期，党在高校建立起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高等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高校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大学建设与发展受到伤害。虽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模仿和探索中曲折前进，但高等教育总体上还是发展的，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急需的人力资本。

(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的改革探索阶段(1978—201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这一时期，党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1999年，党中央决定进行高校大扩招，全国高等教育得以跨越式发展，实现了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体制必然随之进行改革。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单一管理体制，曾在一定历史阶段发挥过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显现，高校缺乏自主办学活力。1992年11月，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召开，国家教委指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高等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有机统一起来”“要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改革高等教育体制”。1993年党中央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20世纪90年代深化教育改革提供了指南。

世纪之交，党两手抓高等教育，在规模上、质量上同时发力。一方面，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1999年，国家实行高校扩招政

策，使更多的个体享受到高等教育资源，满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人才规模的需求。“截至2002年秋季，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已达1600万人，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8%提高到15%，历史性地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另一方面，重点大学项目积极推进。1995年11月我国启动了“211工程”，1999年启动了“985工程”，这两项教育领域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提高了我国一大批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办学水平。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内涵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做出了全面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跨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等重大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调研，发表重要讲话，还先后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籍专家伊莎白颁发共和国友谊勋章，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回信，给北京科技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提出殷切期望，做出明确指示。在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2019年3月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阐述了“高等学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教育改革发展必须做到“九个坚持”，并对高等教育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和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刻阐述，号召高等教育发展要同党和国家现实目标、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

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新时代，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截至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738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在规模扩张同时，强调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着眼点。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高等教育。在革命战争、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教育理念发生了从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国民教育到现代教育的转变，高等教育制度也经历了独自摸索、延安模式、苏联模式、新型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等阶段。全面回顾党领导和创立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深入总结党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规律，有助于新时代更好地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其确立和完善既有对中国共产党精神理念的移植，又有结合时代背景对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独创改革。

党的全面领导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事业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做好高等教育工作最宝贵经验和最为强大的发展动力。只有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才能把握好我国教育的正确发展方向，这也是我们办好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最大政治优势。

(二) 党的机构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组织保障

党的领导是引领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核心是要处理好党、政、学之间的关系，关键是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实现各利益主体的有机协同，形成党委领导、多方参与、学术自治的高等教育的有效治理机制。党的领导融入大学治理结构之中，需要形成系统化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化的运行模式。大学党组织系统在机构设置上分为校级层面和基层组织：校级层面设有党委及其办事机构；基层党组织设在院系、教研室、研究所等机构。同时，大学建立起一套民主监督制度加强党的领导。如通过党代会、党委会、党政联席会、支部会等形式行使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与监督权。这些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保障了党对高等教育的统一领导，有助于将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大学的每个角落，提升治理效能。

(三)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校治理的现实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党确立了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权。直至今日，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共经历了7次调整：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同时试行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每次领导体制的调整都发挥了相应作用，并且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改进。

高等教育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机制也因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而逐步确立、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201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三章第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院（系）级单位党组织，通过党政联席会，讨论和决定本单位重要事项”。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四章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201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可见，根据多次修订后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被实践证明的可行的现实选择。

（四）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

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创办高等教育的思想前提。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发挥了启蒙、推动、调整和支撑等作用。建党初期，具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倡导创办高等教育。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创办刊物、邀请社会名人和进步人士到高校讲演、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等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高校的开展，奠定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广泛宣传和高校党组织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是保障党领导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证明，高校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党的教育政策和方针才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五)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

无论是为人民服务的高等教育，还是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都是强调高等教育的人民理念、人民立场，都是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党初期，以“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为教育总方针，我们党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制定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劳动群众相联系的教育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高等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明确了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先后做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等教育

发展更加强调为人民服务。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扎根人民，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教育对外开放，都是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实现教育强国的有效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努力做到高考机会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加快“双一流”建设，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将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作为党领导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发力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还要深化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支持为学生成人成才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六) 理论联系实际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教育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最首要的教育原则和最有效的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贯穿于党领导高等教育创立与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虽然在不同时期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不同，但共性在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和战争知识

教育、军事战略战术教育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建党初期，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任务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分析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措施。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办新型高等院校确立起学用一致、学以致用的办学导向，纠正了过去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不注重实质而注重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做法，以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弊病，让学生领会马列主义实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成为党培养干部的重要思想路线，这反映出高校教学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实际问题。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现。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办好中国的教育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他国经验，苏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办学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用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去引领，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去滋养培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方案。

(七)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使命担当

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具有鲜明的使命意识，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个人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始终坚持与时代同发展，为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这已

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最鲜亮的底色。

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这是百年实践所证明的正确道路。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高等学校不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相关内容，深化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认识，教会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科学的思想基础。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之才。同时，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从更高站位、更宽平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

建党百年，经过艰苦卓绝岁月和砥砺奋进实践，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走过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辉煌历史历程，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历史性转折，在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后迈入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阶段。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事业站在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上，正在开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立足“十四五”，面向2035，必须把党的最新战略部署转化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高校。”中国共产党创办和发展的新型高等教育有着独特的性质、路径和方向，为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无法解决的大学本土化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开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未来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对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自信，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砥砺前行。

(一)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全面领导

以建党百年为契机，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根本遵循，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不断优化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使之更加有效和顺畅。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高校各项工作的固本之举，善于运用一切场合、载体、方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时效性；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办学治校的基本功、把抓好基层党建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不断夯实基层党建，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师生最贴心、最信赖的组织依靠，成为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常抓不懈的政治任务，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等方面下功夫。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应该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面向未来，立德树人重点必须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做到育人和育才相统一。

(三) 推进“双一流”建设重大战略，提高高等教育教学科研质量

领导我国高等教育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党的重要使命。应当立足中国国情，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应当面对中国问题，处理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应当服务中国发展，在中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全球尖端领域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办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应当塑造中国特色大学精神，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等教育。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手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高等学校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内涵式发展、改革驱动，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在锤炼特色、深化改革、服务需求中加快建设，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不断深化国际实质性合作，主动融入国家软实力建设，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坚持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

(四)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高等教育创新服务能力

面向未来，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成为大学更加重要的功能，也将是一所大学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放眼全球，机遇和挑战长期并

存；立足国内，创新和发展更加迫切；环顾左右，协同和竞争相互交织；面向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深加广。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面对高等教育激烈竞争，面临人工智能巨大挑战，必须不断创新，抢占发展先机。以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在机制上求得突破，强化教育评价导向。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教师评价和学科评估，加大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放手让各类改革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啃下教育评价这块“硬骨头”。要按照《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要求，破除“五唯”，破中有立，破立结合。在党的领导下，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应当对内聚焦、对外扫描、准确思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确立新发展格局，服务国家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发挥更大作用。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建党百年，党领导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走过了光辉历程。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各高等学校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忘初心、勇担使命，脚踏实地、再创佳绩。（王定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国际教育学院教授；王名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文章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06期。）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百年考察

袁利平

话语是实践的凝练，更是思想的载体。话语体系则是交往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及其内含的理论知识体系，它是人们在一定社会语境中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形式，用以表达特定思想立场与价值取向、传播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关键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地确立了“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战略思想，并指明“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实路径。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作为基于我国本土教育需求的特定哲学观念，是以教师教育理论为思想武器，在顺应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教师教育实践而孕育萌生、持久加工并构建而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理性表达系统，是国家制定教师教育政策和促进教师教育制度变迁的思想基础与先导条件，也是在国际领域形塑我国教师教育形象地位的重要工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全面回顾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演进的百年历程，厘清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呈现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旨在提升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感召力、解释力和影响力，并为创造性地建设面向未来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提供历史养分、思想滋养与理论指导。

一、百年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

话语是动态、流动、辩证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其形塑受不同历史语

境与主体需求的制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教师教育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在革命期萌芽、改革期确立、开放期转型和复兴期渐兴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萌芽与肇始(1921—1949年)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正值五四运动浪潮在国内愈演愈烈之时，在以陶行知、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和推动下，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迅速在中国登陆，并“左右着二三十年代的教育理论”，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萌芽与肇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首先，围绕师范教育的独立性斗争展开教师教育话语构建。1922年11月，“壬戌学制”正式颁行。该学制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实行“高等师范学校与普通大学合并，中等师范学校合并于普通高中”，从而严重影响了教师教育的独立性地位，淡化了教师教育的特质。教育界有识之士就重构独立型教师教育体制发出强烈呼声。在曲折的探索中，1932年、1933年，《确定教育目标与改革教育制度案》《师范学校法》《师范学校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等相继颁布，使中等师范学校在制度性话语的保障下获得了独立地位。

其次，注入鲜明的价值内核，优化教师教育话语逻辑。教师教育话语的能动性在于通过话语逻辑的改进影响教师教育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方略。《规程》指出，“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由此得到明确阐述，使教师教育工作的盲目性得以克服，同时也增强了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逻辑严密性。此外，为了适应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大力兴办各种师范学校和教师训练班，

建立了由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训练班组成的教师教育体制。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师教育话语反映出教师发展与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价值观，蕴含了未来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基因成分。

最后，探索乡村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丰富教师教育话语内涵。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发展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但也不乏类似陶行知、赵叔愚等试图从中国教育发展实际出发，探寻教师教育发展规律的教育家。特别是晓庄师范学校的创立，践行了陶行知培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教育理念，完善了近代教师教育体系，在话语空间上开创了我国乡村师范教育的先河，丰富了我国教师教育的话语内涵，提升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中国化程度。

总体来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含有教师教育概念的表述开始在国家制度话语中呈现出来，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内化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促进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转型与正式确立。但这一时期，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仍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教师教育话语的影响，其带来的师资减少、教师教育质量下滑等弊端，阻碍了中国教师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确立与衰败(1949—1978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摸索教育振兴的真理与路径，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教师教育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确立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首先，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通过制度形式正式确立。从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改进方案的探讨，到19

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为师范教育发展规划较为完整的框架，再到1952年《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的筹备酝酿，现代化意义上的师范教育制度体系得以正式确立，并增添了“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阶段性话语成果。自此，我国教师教育有了正式统一的方针、任务和课程设置，确立了必要的办学标准，走上了独立化的高速发展轨道，初步形成了正式的教师教育制度话语体系。

其次，教师教育话语内容出现中国化与苏化的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守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学校进行教育改革，应坚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稳步前进。”1952年，我国在借鉴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调整了高等师范院校，强调“每个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健全的师范学院，……师范学院教育系的任务是培养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心理学与逻辑学等科目的教师”，从而丰富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话语。然而，由于受教师极度匮乏的现实条件制约，我国逐渐试图摆脱苏化教育模式，积累教师教育模式的中国化经验，并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上确立了该时期以增大教师教育数量为中心的话语内核。会议规划了在今后五到十年的时间内，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短期训练和拓展教育形式为重要手段，加速达成我国培养百万合格标准的人民教师的重要目标。这一时期出现的如“全日制师范学校”“半工半读”“业余中等师范学校”等具有中国现实特色的话语，充实和拓展了教师教育的内涵与外延，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吸收、融合与博弈中实现了地位提升。

最后，教师教育话语空间由职前逐渐向职后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教师教育的关注点从职前培养的狭隘视角逐步

延展至在职培训，通过1952年《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师进修问题的通报》和1955年《教育部关于加强中等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等系列文件，正式确立了中小学教师培训制度。1961年10月，第二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召开，提出“努力改进教师进修院校和函授夜大学等其他教师进修组织工作，进一步健全教师进修制度”。自此，我国教师教育话语实现了从职前培养到职后培训的重心转移，教师教育话语的时空延续性和广延性得以增强。

总体来说，该时期以扩大教师教育数量为主的教师教育制度话语体系的初步形成，使得我国教师教育制度日趋完善，并促使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从潜在化表达向概念化初步构架嬗变。但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仍以中央主导为主，地方和师范院校等话语主体责任自觉较为不足，主动参与话语构建的积极性与反馈性不强。“文革”时期，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则陷入了混乱与衰败之中。

(三)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转折与发展(1978—2012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工作在教育领域迅速展开，开启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重建之路。该时期，党中央辩证总结历史经验，以实事求是原则指导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探求教师教育话语内核与现实语境的契合点，促进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钳制中实现突围，取得了积极进展。

首先，教师教育话语的战略地位得到实质性提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党中央在思想认识上将教师教育上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战线的实际来看，解决教育问题的关键在于搞好教师教育。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师范教育提到发展教育事业

的战略地位上”的指导意见。2002年,《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快教师教育的发展,提高教师教育的水平,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二,通过师范教育立法和出台相关配套文件充实了教师教育的法制话语。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审议通过,对维护教师合法权益、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规范化开展教师培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教师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落实提供了法律保障。为贯彻实施《教师法》,国家教委又于1995年和1997年先后颁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系列配套法规,从而进一步充实与细化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的法制话语。

其次,教师教育话语的标识性概念更具中国特色。具体表现为两点。第一,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师教育体系。1996年9月,国家教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在优化结构与提高质量的核心理念指导下,提出要逐步推进由三级师范向二级师范过渡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教师教育体系。自此,中等师范逐渐退出我国教师教育话语的观照视阈。与此同时,我国教师教育的规模体系日益开放化,鼓励综合性大学创办教师教育,倡导教师队伍的多学科融合发展与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第二,坚持中国特色方案,提升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中国品格。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领域创新发展的亮点主要表现在构建职前与职后一体化培养体系,促使高等院校承担起教师培训职责,并促进高等教师教育的学术性知识话语与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性知识话语平等对话、融通超越。自2010年起,“国培计划”在我国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培养与培训二元分离的结

构得到改善，同时也凸显出党中央集中中国力量解决中国教师职后培训问题的中国智慧。

最后，彻底实现从师范教育到教师教育的语境转型。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教师教育”这一明确的话语概念首次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正式取代原有的“师范教育”，极大地丰富了“教师教育”的话语内涵，实现了教师教育体系的语境转型。自此，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化阶段，在话语空间上实现了由职前培养向职后培训的重心位移，在话语内涵上实现了从工具本位向价值本位的逻辑转换。

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进时期，我国教师教育呈现出结构日渐高层次化、规模日益开放化、培训体系日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师范院校在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型过程中，办学特色弱化、教师质量与数量地区差异增大等新问题，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面临新的时代追问。

(四)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完善(2012年至今)

“新时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的全新政治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新时代中国教师教育发展背景语境变迁的精辟总结。这一时期，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与促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守正创新，并逐渐趋向成熟与完善。

首先，规划了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路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教育事业，用“四有好老师”等具体话语为我国教师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一，以理想信念作为教师培育的不竭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正确理

想理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终身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意识，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师教育的重要抓手。第二，以道德情操作为教师发展的成长阶梯。教师作为学生的榜样，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青年一代的生命灌溉和精神濡染。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将师德师风视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第三，以扎实学识作为成就教师的关键要义。培养具备扎实学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需要从招生源头上吸引更多优质人才，从空间跨度上构建职前与职后、城市与乡村教师教育一体化培养体系，从培养范式上促进“高校—地方政府—教研机构—中小学”四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积极融通教师教育学术话语、实践话语和政策话语。第四，以仁爱之心铸造教师的成就之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等话语表达揭示了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同时，党中央也通过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式，以外部力量引导和激励教师热心从教。

其次，赋予了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缔造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的教师队伍已成为新时代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新的价值内核。党和国家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教师学历结构、保障教育队伍质量均衡发展等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公费师范生”等脱胎于中国实际的特色话语，以灵活多样的形式丰富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并蕴藏“人民至上”“教育为本”等话语逻辑，为构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增添了无限活力与持久动力。

最后，开启了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新叙事。该时期，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呈现出一个显著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文件、讲话和宣传话语等媒介呈现的具体话语增多，特别是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的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全面论述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进一步增强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凝聚力与号召力。“鼓励教师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等接地气的系列话语，浓缩了政治性意蕴、提炼了哲学性思维，是面向人民的通识性表达。这种新的叙事逻辑与阐释技巧与为人民服务的话语立场不谋而合，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总之，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百年探索中，经历了从潜在化地表达到概念化地陈述再到系统化、具体化地阐释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坚持了话语发展的持续性与创造性，形成了立场坚定、逻辑严密、表达生动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话语体系，越发显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自信。

二、百年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相较其百年风华正茂时期，显现出明显的时代落差。在百年实践探索过程中，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实现了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自信到自信的历史嬗变。

(一) 从借鉴到独立：凸显教师教育的话语自信

在纵向的历史审思与横向的外来借鉴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提升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是百年来我国教师教

育话语体系变迁的一条关键性逻辑主线。

我国教师教育历经学习美国、效仿苏联的吸收借鉴阶段，但这种对外来教师教育模式全盘接受、盲目借鉴的做法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和教育发展实际，甚至最终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党中央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开展具有中国特色、面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将其具体落实到我国教师教育改革行动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验证中，形成了契合我国教育实际与教师教育改革发展需求的，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综合性大学共同参与的定向与开放相结合的教师教育培养制度，实现了由不自信到自信的话语立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我国教师教育理论创造力的显性体现，更是制度自信与理论自信的集中表征。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百年探索中完成了从借鉴到独立构建，为下一步向着“推广”与“走出去”的更高目标前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 从零散到系统：提升教师教育的话语自觉

话语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随着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实践性内涵不断丰富，党中央对教师教育的话语自觉得到进一步提升，由遵循外在压力影响下的被动形成逻辑向基于内在发展需求自觉塑造的逻辑嬗变，教师教育话语形态呈现出从零散到系统的演进轨迹。

第一，自觉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在百年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中，话语主体主要通过在层级上完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一体化机制，将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的职能都交由师范院校。除此之外，部分师范院校还承担了教师继续教育中的学历教育，增设了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和教师教育学位点，在培养规格上，实现了从封闭的教师教育体制向开放的教师教育体制的转型。由此，一方面，使得具有办学条件的综合性院校获得了教师教育的合法性地位，提高了教

师职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教师教育注入了鲜活血液；另一方面，使得已有师范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摆脱单一的藩篱，以学科融合为切入点优化教师教育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促进教师教育发展，提高教师培养质量。主体多元、开放自主的教师教育培育规模在百年探索中逐步形成。

第二，自发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共识性。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通过系统的话语表达，将主体思想和价值观传递给受众客体的一项系统工程。话语客体能否自觉接受某一话语体系是其传递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自觉地把握人民群众的认识发展规律，践行了将复杂抽象的学术概念具体化、生活化与简单化的话语表达改进策略，因此更有助于将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价值理念和对人民群众的终极关怀有效传递至话语客体，增进人民群众对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共识。

第三，自主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引领性。教师教育话语能否作用于现实并对教育实践起到指导与促进作用，是检验其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准。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在百年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蕴含公平理念、高质量发展价值、人民至上情怀的说服力很强的体系，它揭示了我国教师教育体制运行的内在价值和基本逻辑，如今，在尊重历史、回应时代的基础上，正向教师教育的现实调适精准发力。

(三) 从一元到多元：丰富教师教育的话语主体

话语主体是话语体系建设的能动性因素，是话语内容的创新者与表达者，也是话语平台的建设者与拓宽者。从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的话语形式来看，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主要由以党的重要政策和报告文件为主要载体的政策话语和以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为主要载体的学术话语

以及以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感思与反馈为主要载体的实践话语等构成，分别形成了政策性话语主体、学术性话语主体、实践性话语主体，实现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主体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第一，政策性话语主体从管理走向治理，并不断凸显出对政策话语客体的观照。随着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历经萌芽期和确立期的探索，为打破封闭型教师教育体系的局限，教师教育话语主体迎来了由中央集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历史转型，逐步完善了“中央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共建话语格局。

第二，学术性话语主体话语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主要表现为由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研究者组成的教师教育研究队伍异军突起，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教育研究》和高等院校主办的《教师教育研究》《教师教育学报》《当代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论坛》等专业期刊兼顾前瞻性与科学性，搭建起了具有时代气质的教师教育学术型话语平台。

第三，实践性话语主体地位从边缘趋向中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问题是新时代我国教师教育发展亟待解决的最大现实问题，要求教授教育学的教师到一线学校去与中小学形成伙伴关系，搭建一线教师与师范院校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交流反馈的畅通平台，致力于形成实践性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平等对话新格局，保持学术话语对实践话语的开放与自觉。

(四) 从职前到终身：拓宽教师教育的话语空间

“教师教育”与“师范教育”的话语交替是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发展历程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一个关键性节点。2001年，我国“教师教育”概念话语的引入覆盖相关教师教育政策与实践领域，加强了师范教育与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等终身学习体系的相互联系。“教

师教育”实则是对“师范教育”的超越与升华，不仅表现于说法的改变，更体现为话语空间的转换和话语概念的蜕变。

一方面，教师教育概念拓展了教师教育领域，将教师教育的话语空间由职前培养延展至教师职业发展全过程。较之“师范教育”，“教师教育”在话语形式上更具有系统性、开放性、专业性、持续性和国际性等显著特征。即：教师教育融通了职前培养、入职培训与职后发展的系统领域，践行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理论，形成了“教师教育者”“学习者”等新的教育角色定位，确立了我国教师教育话语在国际教育领域内的规范性表达。另一方面，教师教育概念话语的更替将终身教育话语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教育话语实现了从旧的“终结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型，使得教师教育在培养形式上既包括专门化的学历教育，也包括非学历培训，从而充实了教师教育话语空间，实现了教师教育话语内容的价值逻辑从知识导向逐步向能力导向迁移，“师风师德”“教师素养”等新型话语的凸显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教师教育话语的内涵与外延。

三、百年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在百年探索中形成了延续稳定的话语品格与自主创新的话语内容，构建了一套立足中国大地、指导中国教师教育实践的话语体系。经过百年连续性和开拓性的探索，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学理性和生动性不断增强，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核心使命、内生动力、主体任务和基本样态等方面。

(一) 核心使命：打造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弘扬社会主义教育价值观的生动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旨在以师德师风建设为中心环节，以教师质量为基本依托，以尊师重教的话语环境为外部

支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整体合力。

首先，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师德师风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重任的关键。“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等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师德话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凝聚中华民族价值追求的时代表述，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了本土方案的价值导向与内容规约。其次，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是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在教育阶段上，我国将教师教育体系从职前教育延展到教师职业成长全过程，建成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的终身学习系统。在教育理念上，基于现行教育条件及社会主义办学的核心要求，我国将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纳入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从理想信念及专业素质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师教育作出质性规定。再次，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为稳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环境保障。党中央及地方政府坚持用行动话语自觉践行尊师重教传统美德，通过确保教师工资水平不断提高，面向全社会总结、肯定与赞扬教师的突出贡献等实际行动，充实了提高教师社会地位、职业尊严和经济地位的话语表达。

(二) 内生动力：构建以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

造就以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是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内生动力，是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立场的价值澄清。以人民满意为核心，要求主动发现人民群众对好教师的现实需求，深入了解人民群众对好教师的时代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好教师的事实诉求。纵观百年教师教育实践探索，我国人民对好教师的认识逻辑实现了“数量—质量—均衡”的层级跨越，为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和现实指导。

首先，积极扩大教师队伍，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师

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教育发展需求基数大而中小学师资力量极度匮乏的现实情况，党中央一方面从学历培育层面扩大高等师范院校规模，另一方面从非学历培训层面探索并开设短期培训班等形式，缓解特定时代我国师资匮乏之难题。其次，切实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为提高教师质量，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主要从学历补偿培训入手，整体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在内容上从专业培养结合理论传授层面入手，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并广泛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学科，让“教师”真正成为一种专业。再次，深入推进教师质量均衡发展，建设一批面向新时代的、党和人民满意的教师队伍。党的十九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引发了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均衡的新诉求，乡村教师质量不高作为乡村教育发展的短板之一，成为亟待解决的教育难点。对此，国家构建了“政策上倾斜、资源上扶持、手段上创新”三位一体的乡村教师教育话语体系，规划了职称评定向乡村地区学校倾斜，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通过实施“国培”“省培”，搭建免费、共享、信息多元的“互联网+教育”现代化教师教育培训平台等路径，实现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三) 主体任务：提升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的话语权力

权力是话语运作无处不在的支配力量。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任务，提升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与学术话语权是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发展话语权力的两条主要路径。

首先，提升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学科建设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学科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的话语权力。从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培养教师教育方向的博士生，到201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正式向国务院学位办建议新增教师教育学科，教师教育正式成为教育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培养课程与规划从

无到有，人才培养规模从小到大，见证了我国教师教育学科从发展到独立的历程，为提升教师教育学科话语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有利于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涌现出更多的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其次，提升教师教育学术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萌芽与肇始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步生成的，决定了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构建过程中，势必面临外来与本土话语权的双向博弈。如何用中国标识性话语表达好教师教育发展的经验方案与学术成就，探求学术话语权力与国家综合国力相匹配，是伴随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重大课题之一。提升我国教师教育学术话语权，一方面要增强理论自信，理性而辩证地稀释西方主导建构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积极探索富有本土特色的中国概念、中国词汇、中国表达；另一方面要加强话语规范，增强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普适性、规范性和流畅性，进而提升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向外传播的解释力与生命力。

(四) 基本样态：凸显教师教育战略地位的意识基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等话语表达，体现了党中央对教师教育战略话语作出的新阐释。凸显教师教育战略地位的意识基底是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样态，也是促进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核心观点。

从话语来源来看，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从时代背景、教育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充分吸纳话语元素。无论处于什么时期、在何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把教师队伍建设视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不断从“立教兴邦”“尊师重教”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滋养，从“人才的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是教育发展

的第一资源”等教育实践中吸收现实指导，从“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中解码时代基因。从话语内容来看，我国教师教育话语在继承中坚持教师教育战略地位表达的稳定性与一贯性。从1951年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中心环节”，到1980年第四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工作中的‘工作母机’，是造就培养人才的人才基地”，再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教师的慰问信中“教师是立教之本、教师是兴教之源”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以一脉相承的话语，继承并确立了教师教育“群学之基”的独特性作用，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语境。

四、百年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现实启示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形成了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思想和实践，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通过百年探索所蕴含的价值内涵越来越深刻、演进逻辑越来越鲜明，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在建设上走出了一条不忘历史经验与时代呼唤的升级之路。基于百年来教师教育历史与实践的探索逻辑，总结归纳其现实启示，理性思考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未来路向，持续创新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表达和叙述，是新发展阶段我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一) 遵循教育规律，夯实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思想根基

正确的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基础与前提。教育规律作为教育事业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其客观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遵循教育规律，强化教育理论，突出教育问题，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大环境下的方向指引、价值导向和规律制约，是夯

实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思想根基的必然选择。首先，辩证看待师范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不应回避师范性与学术性之间的争论，但也不应过度将二者对立化。纵观百年来教师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要充分树立师范性是教师教育的初级和基本要求，学术性是教师教育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规律性产物的思想认识。随着我国教师教育实现由数量扩增向质量提升的内涵转型，学术型教师话语的出场是解决师范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的必由之路。其次，正确处理好独立型与开放型之间的关系。我国教师教育在百年探索中历经了开放与独立摇摆不定的发展历程。历史与实践证明，开放型的教师教育体制有利于扩大教师教育主体、延展教师教育领域，但也要立足我国国情，处理好由以师范院校定向培养为主导兼顾综合性大学非定向培养的综合模式，向更加开放的教师教育体制发展的过渡与转型。再次，坚持终身学习的价值导向。赋予教师“教”与“学”的双重任务，构建面向教师职业终身的能力与素质一体化培养体系，实现教师从“懂教”“善教”到“乐教”的自主转变。

(二) 恪守本土立场，厚植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理论自信

坚守中国立场，厚植理论自信，构建中国本土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具有时代紧迫性。首先，要认真考察与提炼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发展的历史经验，客观分析与总结中国教师教育发展从数量入手到关注质量的发展逻辑，从关注效率到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发展理念，有序开展中国特色教师教育发展理论与办学实践的系统研究。其次，重视中国特色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构建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厚植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理论自信，实际上就是实现教师教育话语从借鉴到本土化的超越，在路径上要善于挖掘内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的话语脉络，使其一方面成为构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新材料，为诠释我国教

师教育话语提供创新表述，另一方面成为与西方话语相区别的独特标识，弥补西方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局限性。总体而言，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实质上就是要促进教师教育话语实现全球视野、本土立场和学术视阈的辩证统一。

(三) 立足全球视野，坚持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辩证思维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和合”理念所内含的人文精神的当代转化，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可达成共识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导向。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新时代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肩负着更重大的时代使命。首先，要理性认识我国教育实际以及中外教师教育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面对西方教师教育话语的强势渗透，要时刻以理性思维掌握我国具体国情及教师教育发展实际水平，挖掘制度话语背后的文化差异，审思话语借鉴与话语移植的可行性路径。其次，要持辩证思维看待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未来我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发展创新势必以国际舞台为中心，置身多元话语冲突、融合的交错地带。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内外反复提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阐明了我国在固有的“对立—妥协”国际话语交流模式下，谋求一种差异共生的新常态下的话语立场，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担当起促进发展中国家教师教育话语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职责，立场鲜明地展示了“以和为贵”“兼容并蓄”的中国传统智慧。

(四) 坚守人民情怀，彰显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在百年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秉持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的理念，内在地揭示了不断强化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人文关怀的价值逻辑和构建为人民服务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价值使命。首先，强化以人民群众为话语中心的价值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新期待。充分关照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教师教育的新需求，不断以“高质量发展”“教育质量均衡”“教育公平”等面向教育本质的价值性话语扩充教师教育话语内涵，寻求教师教育话语体系面向未来的话语转型空间，增强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生机与活力。其次，尊重人民群众的话语客体地位，不断深化面向人民群众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其中，广大人民群众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最大的受众客体，教师群体是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最直接的受众客体。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发展的道路优化路径指向创新话语传播策略与话语表达风格，依托理论，但同时也要面向群众生活，讲老百姓真正乐于听、听得懂、能接受的话，使人民群众自觉接受与维护教师教育话语体系。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内涵优化路径指向关照一线教师的话语客体地位，充分了解教师的需求与反馈，不断塑造和提升教师群体话语主体与受众客体的双重身份地位。

(五) 把握时代关切，树牢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导向思维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要想提升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解释力与说服力，就必须紧握时代脉搏，树牢问题意识，满足现实调适的新要求，迎接时代关切的新挑战。兴国必先强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作为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规划和实现民生工程的根本任务之一。从师德建设、教师资格体系和准入制度、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教师待

遇保障体系等全方位入手，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未来发展勾勒了创新、完善、逻辑严密的行动框架，为中国教师教育话语体系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时代活力，提供了发展导向。“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等时代表述将丰富我国教师教育的话语体系，充分指明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前进方向以及它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进而作用于社会现实，指导教育实践，促进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实现教师教育在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中的特殊使命。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话语作为思想与语词的融合体，其流变形式反映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等的深度融合。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中国教师教育话语在从萌芽到确立、从衰败到重塑、从转折到发展的进程中行稳致远，不断创新与完善，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凝聚了人民性、时代性、学理性、生动性等具有中国标识的教师教育话语价值内核，以不断提升的解释力、感召力与影响力逐渐从失语到发出时代强音，从话语边缘向话语中心位移，成为向世界展示与描述中国教师教育发展现状的话语思想体系。教师教育实践发展永无终点，教师教育话语创新永无止境。面向未来，中国将在历史回应、现实回响、人民呼应、全球召唤与教育规律“五位一体”的积淀中，共同编织与构建体系更加全面、认知更加深刻、创新性更加突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话语体系。

(袁利平，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文章来源：《教师教育学报》，2021年第04期。)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百年发展

刘齐 张睦楚

一、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把建设和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事业和战略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百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质的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使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如今，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正在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新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持，为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回顾过往数年的相关学术成果，部分学者从社会发展、政策等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化了人们对近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艰辛曲折发展历程的认识。

顾明远在《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一文中，详细梳理了1921—201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走过的90年历程，指出这是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历程。新民主主义教育重视革命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作为自身教育发展的首要选择。朱永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教育》一文中，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在规模、质量上的巨大飞跃。金鑫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对高等教育领导方面的育人优势、社会服务优势和引领文化优势。此外，张晓萌与王延强分别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新型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与北方大学对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理念实践

历程进行了相关考察。李宏刚等对党领导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从改造旧的高等教育体制、创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目标的实现，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此外，夏泉、万美容等从不同角度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新时代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妥善处理好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与发展矛盾。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们有必要回溯并总结这段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为谁办高等教育？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办高等教育？这些不仅是纪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历史进程里程碑，同时也是谋划明天高等教育发展的依据。

二、“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为人民办高等教育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应社会发展需要而生，随社会发展而变，同时又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教育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态。在阶级社会，政治作为阶级利益的集中表现，使得教育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其影响。因此，为谁办教育，是办教育的出发点，也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内容和任务。

(一) 传统教育目标在近代中国的缓慢变革

“学在官府”“学术官守”和“官师合一”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极为突出，虽有民间私学，但亦摆脱不了阶级的限制，广大劳动人民更是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到了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遭列强入侵，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不断割地赔款，给人们以极大震撼，使得“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但因当时内乱外患、财政濒于崩溃的边缘，加

之外交、军事等新问题，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将重点放在了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之上。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日渐觉醒，不少人开始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一些高级官僚，如河南巡抚锡良等，也纷纷批评旧式教育的积弊，呼唤新的教育，认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

庚子之变后，清廷已处在覆亡的前夕，一切都在剧烈变革之中，教育首当其冲。从1900年到1911年，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经历了改造书院、兴办学堂、改良私塾、建立教育行政和确立教育宗旨等一系列步骤，以诏令兴学、学制颁布和科举革废为标志，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但在这些发展的背后，也呈现出明显的局限和不足，特别是教学内容的封建性、留学教育的保守性和除旧革新的滞后性几乎伴随始终。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社会心理以及与之相应的传统封建教育带来了猛烈冲击，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的解放，并以巨大震撼力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变革，使教育近代化的一些基本内涵“生动鲜明地在理性思考和实践活动的两个层面突现出来”。民族资本主义“新事业”的继之兴起，又使得教育界开始以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和考虑问题。

但国步艰危，几千年来中国人早已适应的一元结构突然崩塌让人一时无措。彼时各地军阀混战，各自为政，更让教育事业陷入困顿和迷惘之中。主义观念蜂起，教育思潮迭兴，使得各地的教育政策千差万别，实施效果差强人意，而政治家们的口号和教育家们的理念又虚无缥缈，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接受教育的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高等教

育更是人们的奢望，当时的中国教育只能在艰难中缓慢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擎反传统的批判大旗，猛烈荡涤着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的污泥浊水，对因袭几千年来传统价值观发动了全面攻击，从而给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探寻中国革命的前途道路的时候，也逐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在革命中的地位和教育的阶级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教育改革到底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与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的“教育救国论”的旧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完全不同，从而开启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历史时期。

(二) “普及教育”——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追求与努力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由此，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担负起了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历史使命，终于使中国亿万劳动人民梦寐以求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逐步变为了现实。

教育是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党的纲领、方针和政策中，明确提出了党在文化教育工作中的任务。关于党的奋斗目标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可见，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实现人民群众接受教育作为革命和奋斗的方向。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政权的教育方针，即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女，在教育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劳苦民众的受教育权利予以充分保障。毛泽东将此概括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

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由此，这一教育方针贯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领导下的高等教育之中，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规定了此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等教育。在此方针的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有：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①、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中央列宁师范学院、中央农业学校、陕北公学、延安大学②、中国女子大学、建设大学、北方大学、华中大学、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医科大学、军政学院、军事学院、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等。这些学校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可谓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办学理念、模式、方法均受到当时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兴办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也培养了数万名堪称“革命的先锋队员”的优秀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步入现代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接管、恢复并整顿了旧有大学，同时也积极创建发展新大学。在经过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一大批高校纷纷建立，高等教育事业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高等院校中的领导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在一切高等学校中，应当实行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高校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与此同时，从1950年至1965年，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逐步建立并日渐完善。其中，在报考条件、招考计划、专业设置等方面都明

显向工农大众倾斜。从1952年的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到1977年恢复高考和1999年高校扩招，再到2014年全国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同时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向新征程的标志。

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一时期，在教育工作中也出现过失误，但由于党中央坚决纠正了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并依靠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在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发展迅猛，高等教育也加快改革，稳步发展，提高质量，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以实现共享发展为要求，明确了教育公平推进的工作重心和难点，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为了让更多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孩子上得了学，接受高等教育，2014年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等。

如今，中国的高校数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205所到“十三五”末的2688所，增长了13倍；在校人数则由1949年的11.65万人发展到2019年的4002万人，增长了近343倍。让人惊叹的数据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那就是让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让教育权利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高等教育，让高等教育惠及亿万大众，让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这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执政自觉，开启了为人民办好教育的新征程。

三、“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办人民的高等教育

鸦片战争以来，许多仁人志士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是导致国家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改变这一状况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教育事业，“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人们将教育的功能上升到了促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层面。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教育任务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关注到了教育在民族独立和解放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将高等教育置于突出的位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就成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所革命大学”。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工农运动的领导骨干，总结了许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中国革命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对该校办学宗旨作了规定，即“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这寥寥数语，显示了湖南自修大学与传统书院和当时的学校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1923年4月，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努力研究致用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这充分体现了党的二大宣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精神，也要求学生学以致用，

为改造社会作准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即在1937年7月23日指出，教育须应时而变，对那些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要“根本改革”。在同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制度、课程要“以抗日救国为目标”。在193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抗战时期的教育政策论述得更为清晰，即教育事业“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让教育适合战争的需要，把教育与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战时期教育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后来也成为抗战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的指导思想。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宣传、动员、组织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并支援解放战争确定为教育的主要任务。在这些方针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高等教育普遍发展，这些新型的高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坚持办学，培养和输送出一大批抗日民主斗争的领导干部和各类优秀人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为全国解放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伟大贡献。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由为维持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服务，转变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有力武器，从而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任务的调整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50年，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在恢复生产建设和推动社会进步中重要作用的认识。随后，为尽快使高等教育与国民经济恢复、民主改革相适应，使高等教育回

到人民手中，确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领导地位，开始了接收、接管、接办工作，并逐步加以改造，同时厘定学制、改革课程、调整院系。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却适应了国民经济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的迫切需求，初步改变了高校过于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合理的格局。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由此，毛泽东提出的“三育两有”和“两个必须”成为当时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原则同中国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的产物。它为中国高等教育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指明了方向，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人才培养规定了明确的目标。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需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被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使得高等学校在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从而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江泽民多次强调要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科技和教育，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社会都要关心教育、支持教

育，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谈到高等教育时，他指出：“高等教育要积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研究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方面军。”这些都使得原本以培养人才为主的高等学校职能更多地向发展科学、服务社会方面扩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把科教兴国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明确指出：“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正是在这些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指引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国家重点工程——“211工程”建设。“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建设，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与继之开展的“985工程”建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到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2979万人，在校生数达到2826万人，其中研究生数为140万人，高等学校毛入学率达到24.2%，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计有9830万人，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

视，对高等教育尤为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习近平总书记对高等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进一步回答了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重大问题，也突出强化了我国高等教育“为人民服务”这一鲜明特质。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发展普及化阶段，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巩固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育特色学科、支持优势学科、发展交叉学科，增强高校的国际核心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愿望。

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和《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先后印发，正式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同时，为配合深入实施新一轮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在中西部也遴选出一批有特色、高水平的地方高校和一批特色优势学科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到2020年底，首批入选的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建设一流师

资团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水平、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着力推进成果转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最根本的价值属性，高等教育始终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与劳动群众相联系，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又积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国家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专业人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作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迈入了大众化阶段。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高等教育也要为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服务。要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总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就是要顺应时代要求，适应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一部在前进过程中不断奋进、不断主动适应现实、不断寻求适切内涵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履行自身发展使命、不断调整教育目标转向的理论实践与奋斗史。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变迁

众所周知，从发展模式与价值选择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自古至今都具有十分强烈的工具性取向，这主要体现在外部与内部两方面。首先，从中国古代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

一直具有某种“功利”的目的，培养的人才无疑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具有“社会取向”，传统的高等教育体制下所培养的人才不免于“非自由”的束缚。其次，在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价值取向下，“经世致用”无疑是高等教育体系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萌发、发展到初步制度化难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发展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传统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初步实现了培养目标、系统发展与功能体现的早期现代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出了一系列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方向。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提出了教育文化发展的总体方针与发展内涵，就是使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真正“站起来”，建立让全体中华民族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体系，消除一切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区分，使全体民众享受到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效用，使人民群众通过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真正实现当家做主，在世界高等教育的舞台上真正“站起来”，发出属于中华民族的声音。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述了特殊战争时期我国苏区教育的根本方针，其任务目标是将中国的高等教育办成令人民满意、使全体工农群众与广大人民享受到的教育体系。在这一内涵引导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干部教育体系，初步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早期现代化提出发展目标并奠定了初步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战争现实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为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改革勾勒出一条新的思路，也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勾画了脉络，其中针对高等教育方面的教育方针尤为令人瞩目。一方面，方针进一步扩大了高等教育团结统一的

战线，将更多的工农群众纳入受教育的范畴中，真正从实际上阐述了解放战争时期高等教育对全体人民群众“有教无类”的观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教育功能与影响方面作出了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抗战现实需要。

中国共产党对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价值取向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即解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高等教育的宗旨以培养合格的社会建设者为根本。由此可见，自解放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有着深刻的内在涵义。首先，这一发展过程表明高等教育模式结构及教育理念得到了螺旋式的深化，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的价值呈现出多极化、多维度的价值取向。具体来看，高等教育这一变革过程既说明决定高等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在于适应现代生产与人才培养的需要，体现出教育理念需要兼顾现实融合又要关注政治需求的特点，因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高等教育发展势必嵌入实际需求当中，高等教育发展也势必要对社会现实作出强有力的回应。其次，这一时期的教育标志着高等教育已开始有意识地从为革命战争服务逐渐转向为国家建设事业服务上来，从而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使命，充分考虑了生产与生活实际，正确处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国高等教育建设轻重缓急一系列问题，保证了解放战争时期教育最迫切需要的满足。

(二) “内涵式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及社会职能。为了有效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全面恢复和发展经济，国家首先采取的是嫁接与探索并重的战略，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故而中国教育制度在沿袭既往模式外，开始思考借鉴苏联经验。1949年9月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形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定下了基调，即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950年后，我国采取了学习苏联“一边倒”的国家建设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集中开展了全方位学习苏联高等教育经验的改造工作。具体来看，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改造运动主要表现在树立苏联模式典型、聘请苏联专家对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实地指导、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取经、引进苏联的高等教育教科书及教学大纲等，以及在大学大规模地发起学习俄语热潮等各方面的运动。此后近二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因素，高等教育缺乏学术精神，教育系统的设定也附着于我国各项政治运动，可以说，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偏离了既定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有违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规律。

高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重新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置于重要地位，既考虑了社会的要求，又观照高校内部的改革及创新，这些策略主要包括社会需求、多元化办学的彰显、体制的转向和教学质量的提升4个方面。在这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重点突出“策略导向”，可以说策略是行动的纲领和方法，是达到目标的必经之路，因此高校内涵式发展的事实策略既从高校本身的实际出发，又带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创新性。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进一步深化时期，国家已深刻认识到高等院校的发展规模及速度、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学科结构、优化学校布局等方面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核心命题，高等教育相关机构需要通过适当调控以进一步落实我国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及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江泽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及方向作出说明，将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建设引向了新的高度，指明了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鲜明地回答了我国高等教育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教育发展目标前进的问题。高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高质量的发展，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各类型高等教育普遍追求的主题。高等教育从规模式向内涵式转换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增强高等教育机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进入21世纪后，以“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建设为开端，我国的高等院校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应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在这一重要精神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进入了全新阶段，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通过结构调整赋予了相应内涵，高等教育规模及培养人才数量对中国新历史阶段的现实需求进行了回应。这一阶段，高等教育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发展模式依然是通过单纯的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的外延式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的路径取向不尽相同。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涵式发展是通过教育结构的转变、教育条件的改善、教育效益的提高、教育质量的提升而使受教育者身心发展水平、综合素质、适应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各方面得到显著提高，是高等教育实践的出发点与根本归宿。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质量建设。在新的时代，应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教育，改革高等教育育人机制，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目标，以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为核心，重点抓高校软实力，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加快高校人才质量及内涵式提升，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各类功能。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新时期高等院校更应牢牢抓住发展契机，将教育事业置于优先发展位置，进一步加强质量内涵建设，更好地建设教育强国，以便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使命。当前，我国已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也要以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来谋划自身发展具体方向，增强高等院校所应具有的时代气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的新年贺词中，将“教育”列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之首，这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真正办好办实”，“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高等教育上，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和《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中提出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与现实路径。“双一流”大学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高等院校，要大力推进一批有潜力的高等院校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压力与动力共存，我国高校必须加快教育教学质量的内涵式建设，进一步明确高校相关的责任主体、建设主体、教育主体，才能更好地服务新时代社会发展与我国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将“教育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的教育方针，十九大提出了“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正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更是人民对于美好

幸福生活的新期待，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和使命。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十个更好”回应人民关切。其中，“更好的教育”排在首位。教育既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也是民生所系。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就是要着力解决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好的教育。

我国的高等教育走过了一个世纪，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发展的具体导向，向教育系统内在本真发展的初心靠拢，办令全体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铸就高等院校内涵式发展之魂，把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最神圣的使命，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的宝贵经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发展高等教育与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牢牢把握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重大机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植根人民，认真回顾和深入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道路的宝贵经验，以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办学方向，以实践引领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和研究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迈上了新台阶，进入了新阶段，对国家发展贡献度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在新时期内，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要解决为谁办学、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根本性问题。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明

确提出，要“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新时期高等教育建设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具体路径，必须遵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和内在规律。为了办好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等教育，必须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基于此，应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始终坚持的重要理论基础，统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贯穿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全过程，奠定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全新理论基础。

第二，要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高等教育第一要务，适应新时代对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教育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要坚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坚持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始终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同时，高等教育机构还应特别着力于培养大批具有高素质的创新人才，促进我国未来人才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职能不断增加，目标与理念逐渐走向多元化，机构与学科不断得以扩张，中国一跃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大国，建立起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优势的高等教育体系。如果将高等教育理解为生产过程的话，最主要的产品即是高质量的人才。人才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强大动力，只有始终坚持以育人兴学为高等教育的第一要务，才能从根本上满足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

第三，要始终坚持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关键工作，大力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人才的内涵式增长。一般来说，高等教育质量包括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教学质量和校企联合成果产出质量以及服务社会质量等方面。高校扩招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提

供了大量的人力及智力资源，但同时也出现了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大学生就业与创业关系难以调和等问题，因而提高教育质量是未来发展的目标。在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要摒弃单纯依靠以规模扩大和数量增长为要素的发展模式，努力走一条以高等教育本质属性为要求、以高等教育内部诸要素有效开发为驱动的发展道路，同时具有规模适度、结构协调、质量提高、品质提升等显著特征。前已述及，高校与知识之间存在天然的逻辑关系，高等教育的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构成了现代高等教育的职能体系，亦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这三大职能分别对应知识劳动的3种形态，分别是知识生产与创造、知识传承以及知识应用，其劳动资料均是高深的知识。教学职能是最早出现的本体职能，研究和服务则是在教学本体职能基础之上先后出现的派生职能。出于国家和社会竞争发展的需要，高校需要以人为本，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机构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高质量人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职能都要服务于这一功能。

第四，要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建立全新的高等教育目标管理与评价体系，进一步规范高等院校内部学术治理结构。在新时代，应更加注重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的障碍，释放高等教育机构的活力，解决好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的“功利性”工具取向问题。要完成以上任务，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坚决克服高等院校中的“五唯主义”，即高等院校人才评价体系不应过度依赖分数、升学、文凭、论文、帽子等硬指标，坚决扭转大学功利化倾向，建立科学完善的高等教育学术评价体系。同时进一步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合作，引导高校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完善高校对外开放评价指标，强调自由平等而非等级秩序、多元分权而非统一集权、民

主参与而非服从管制、均衡共享而非差等分配，从而完善高等院校内部学术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应深化落实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新时代，高等院校的学术管理应体现为高校教师追求学术自由、高校学科捍卫学术自治、高校内部学术治理促进教师参与治理、学科部门加强学术治理、行政管理人员改进管理，只有建立全新的高等教育目标管理与评价体系，才能进一步规范高等院校内部学术治理结构，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是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极不平凡的一百年：它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高等教育向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和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发展并实现根本性质转变的一百年；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由弱变强迅速发展的一百年；是高等教育结构不断由简单到系统、由单一到全面发展的一百年；是党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不断深化、教育功能不断增强和健全的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及实践过程不断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及民主化的一百年；是高等教育育人理念从工具性取向逐渐走向内涵式发展的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振兴高等教育，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

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之路的百年征程中，深刻回答了为谁办高等教育、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怎样办高等教育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今高等教育与国家事业“同频共振”，进入新时代，我们站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擘画

了我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然而，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依然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答。例如，如何在现阶段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百年来发展的规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未来发展之路？如何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增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能力？如何办好全体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既办好大学又培育高质量人才？这一系列问题，应当是未来发展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建设者所肩负的重大使命。

(刘齐，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后；张睦楚，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云南省“千人计划”青年学者，云南师范大学联大优秀青年英才学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文章来源：《重庆高教研究》，2021年第01期。)

呈：校领导

送：全校各管理部门、院系主要负责人

2021年7月01日